

苏联解体 一个国家的崩溃 如何看 怎么办 苏联解体 我的解读

肖枫◎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在解体 一个大国崩溃 怎么看 怎么办 办共产党 我的解读

肖枫◎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题 词

肖枫同志曾长期在中联部工作，一直从事政党对外交往实践和相关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人虽已离开现职，但手中的笔却没有放下，最近又完成了以苏联解体为题材的新书，我谨对肖枫同志这种勤奋耕耘的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

王家瑞

2011年11月21日

序 言

赵 曜

20 世纪有两件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都发生在苏联。一件是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世界 1/6 的土地上推翻了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开辟了十月革命道路，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就是走的十月革命道路。以十月革命为起点，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在 20 世纪，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够得上“新世纪”标志的，无疑只能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所说的“震撼世界十日”的俄国十月革命。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件是世纪末的苏联剧变。苏联剧变有三重含义：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联盟解体；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苏联剧变有两个后果。一个是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不仅苏联而且它的卫星国、周边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都演变和消失了，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 15 家减少为 5 家，土地面积损失 70%，人口损失 22%，世界各国共产党由原来的 180 家左右减少为 130 家左右，党员人数由原

来的 9100 万左右减少为 6600 万左右（其中当时中国有 5600 万）。另一个是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彻底崩溃，冷战时代的结束是以苏联的失败和消失为代价和前提，东西方力量对比失衡，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更不安宁。这是历史的悲剧和大倒退。一个经过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拥有 90 多年党史、70 多年国史、2.8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顷刻间坍塌解体，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历史之谜”。

苏联剧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界都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文章，尤其是前苏共一些领导人也著书立说，阐述亲历这一事件的过程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20 周年。我国有关学术团体和单位，相继召开了深入探讨苏联亡党亡国的研讨会。其目的无非从中吸取教训，避免这些悲剧在我国重演。肖枫同志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心，准备把他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一本书，并邀我为这本书作序。我虽已入“黄昏”之年，耳聩眼花，力不从心，但还是答应了。肖枫同志长期在中联部从事国际问题和国际共运的研究工作。我和他是在 1989 年中宣部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研讨会上相识的。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研究方向大体相同，算是同行，又有 20 多年的交往，可以说是老朋友了。肖枫同志的知识面很宽，研究领域广泛，是一位多产学者。远的不说，仅从 1999 年以后就先后撰写和出版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三大著作，阐述和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一系列前沿问题，提出了不少能给人以启发的新观点、新认识。肖枫同志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有两大优势：一是能够及时了解中央的有关精神，二是掌握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这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就他个人来说也有两个长处：一是极为勤奋，潜心执著研究问题；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反“左”戒右，勇于创新，见解独到。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为许多读者接受。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把它当做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

人们去研究它。肖枫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是作出应有贡献的。

我国学术界在研究苏联剧变问题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有这种那种“说”，都有一定道理。把各种“说”综合起来，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都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①后人将其称为“历史合力论”。肖枫同志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顺着他的思路，从外因和内因、远因和近因，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先说外因和内因。任何事物发生质变都有它的外因和内因。苏联剧变的外因，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的颠覆活动，先是使用“扼杀”战略，从外部强攻，如1918年14个帝国主义强盗进攻苏联，1941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苏联的突然袭击，但都没有成功；强攻不成就转而从堡垒内部攻破，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战略。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腐蚀和收买党政高官，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就是被西方看中和做了工作的重点人物。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促成事物的改变。内因就是苏共的蜕化和变质。苏共蜕化变质有个长期过程，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又可以分为远因和近因。苏联从建国到解体，就领导人来说共八代，前七代即从列宁到契尔年科时期所犯的重大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对后来的剧变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远因，或称历史原因，是量变过程。主要是三大错误。

一是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斯大林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卫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是他那个时期打下的，苏联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但是，他也犯了许多错误。最严重的就是1934年基洛夫被刺后，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肃反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据吴恩远在《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中所提供的可靠证据，1937—1938年被判刑的大约在130万—150万人，这些人被戴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或处决，或投入监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页。

或流放。此举，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消灭了党政军一大批领导骨干，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信任，在群众中出现恐怖气氛，人人自危，后果极坏，后遗症很大。

二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几代领导人都比较平庸，没有一个够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不久，就被比他精明和鲁莽的赫鲁晓夫赶下台并取而代之。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长达4小时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过多久，这份“秘密报告”就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全文发表，流传到全世界。这份报告采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中有些内容是捏造的，如说斯大林用地球仪指导卫国战争，还使用了“凶手”、“强盗”、“赌棍”、“暴君”、“白痴”等不堪入耳的语言。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篓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苏联不是什么都好，起了解放思想作用。所谓“捅了篓子”，是说报告很不慎重，把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没有涉及到制度，经不起推敲，将会产生不良后果和惹出乱子。果然不出所料，报告不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波匈事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形象被败坏，一些共产党员退党，西方借机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在苏联国内，广大党员和群众不能明辨是非，不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意识形态出现混乱和危机。全盘否定斯大林，无疑是给斯大林当政29年的苏联历史抹黑，开启了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历史虚无主义先河。30年以后，在苏联解体前，苏共有些人曾说，当初我们要有个中共那样的《历史决议》就好了，意识形态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混乱局面。

三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最强，他把苏联的大国主义发展为霸权主义，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同时不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同美国进行马拉松式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最后被综合国力更强的美国把苏联的国民经济拖垮，国力耗尽。由于苏联军事工业发达，民用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引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这几个严重错误，使苏联的社会主

义事业遭致重大挫折，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伏笔”。这几个重大失误又都和苏联模式和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有关。所以，问题不能只归结个人，更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近因就是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宝座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6年多苏共所犯的一系列重大错误。这是苏联剧变的近因即现实原因，是直接原因，是质变过程。这一届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在战后和平年代成长和一步步高升的。在这个班子中，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坚持原则，但由于戈氏身居总书记的最高职位，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氏上台时，虽然苏联已积累了许多矛盾，内外交困，孕育着一切经济、政治、民族的全面危机，但并没有任何垮台和死亡迹象。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如果戈氏等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造性地和本国实践相结合，大刀阔斧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作为一个高明大夫，对症下药，苏联这个病人是会康复，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和停滞状态，快速向前发展的。问题是戈氏是一个庸医，开错了药方，把病人治死，苏联在他任内仅六年多时间就剧变和解体，在地球上消失了。那么，戈氏开的是什么药方呢？有两个。一个是改旗易帜，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苏共党内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和传统，孟什维克派就是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戈氏从1987年9月应美国一个出版商的约请抛出的《新思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科学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彻底转变。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翻版。“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经过几次自由主义化的演变，已经同新自由主义趋同化，成为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和社会支柱。我们说苏共蜕化变质，有其特定含义。一是改旗易帜，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二是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他们饱食终日，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广大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关心的只是维护既得利益，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相当于列宁所说的西方国家的工人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复辟已有了社会政治基础。三是把改革变成改向。苏联当时社会问题成堆，急需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革。戈氏坚持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

想，通过“多元化”，把改革变成改向。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就是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用自由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代之以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并通过民主化、公开性，把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释放出来，把苏联政局搞乱，最后反对派在乱中夺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让资产阶级和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占领这块阵地。这样，苏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彻底演变。正如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所指出：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戈氏一伙右翼集团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苏联葬送，这和苏联模式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有关。在这种体制下，总书记具有无限权力，广大党员无能为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苏联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跌入谷底，西方敌对势力欢呼雀跃、利令智昏、弹冠相庆，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陈旧论”，资本主义“再生论”、“永恒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终结论”，高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交响曲，把它看成是史诗般的、始料未及的“解放”和“胜利”。但是，乐极生悲，苏联剧变后的20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向着有利于资本主义而是向着不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资本主义遭受重创。重创来自两个事件。第一件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美国标志性的建筑物“世贸大楼”和“国防部”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件事震动了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小布什政府借“9·11”事件，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打了近十年。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但牺牲士兵达6000人左右，花掉军费近3万亿美元，导致国力下降，从顶峰中跌落下来。第二件是2008年9月，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破产倒闭为标志，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美和全球的金融海啸，虚拟经济又影响实体经济，出现全球的金

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是继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股市又一次遭遇“黑色星期一”。这几年美国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零增长和负增长。美债危机余波未了，另一波又起，接着又发生欧债危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负债累累，急需“输血”和救助，欧元区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在危机期间，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沉寂已久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再次在欧洲各国兴起，示威游行、大罢工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唯美国例外。今年9月，美国“例外论”被打破了，纽约群众走上街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占领”浪潮迅速蔓延到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波及近百所大学，矛头直接对准金融寡头和高管阶层，其实质是99%对1%，反对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是马克思热。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把马克思“扫地出门”，这次危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又回来了”，《资本论》成为畅销书，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德国财政部长都在阅读《资本论》，马克思仍旧“人气最高”，再次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再一个是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在这次危机中，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制度危机，除德国模式表现稍好外，其余各种模式都一落千丈。这一条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变革具有根本性意义。

二是新兴国家异军突起。资本主义是靠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外无偿掠夺落后国家人民的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资本主义就必然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派生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把世界瓜分完毕，世界分成两大营垒，即一端是欧美等宗主国，另一端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图像，即强大富裕的一极和贫穷落后一极并存。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缘”结构。所谓“中心”，即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缘”，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外缘”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以“中心”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外缘”则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完全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的支持和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三大洲人民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有100多个国家宣布了民族独立，

经营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了。这是改变 20 世纪面貌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所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合理的生产分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跨国银行的重利盘剥、技术转让的高额勒索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最近 20 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时来运转，否极泰来，利用起点低、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等优势，通过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新世纪伊始，2001 年美国商人保尔森在高盛集团公司发表的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一文中，第一次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称为“金砖四国”，此后，“金砖四国”的说法不胫而走。这四国的领土占世界的 26%，人口占世界的 42%，GDP 占世界的 14.6%，但潜力大，发展势头很猛。两年后该公司又发文展望这四个国家将于 2050 年“引领世界经济风骚”。据高盛公司预测，中国将在 2041 年超过美国，印度将在 2033 年超过日本，俄罗斯将于 2028 年超过德国，巴西将于 2031 年超过法国。这样，到 21 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格局将会重新洗牌，全球六大经济体的顺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巴西。为响应国际社会的称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于 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首次召开“金砖四国”峰会，2010 年 4 月又在巴西召开第二次峰会，交流经验，协调立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力促全球变革。2010 年，应南非的要求，四国同意它加入，现已变成“金砖五国”。新兴国家的出现，将极大地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

三是社会主义的回升和中国的崛起。苏联剧变后的 20 年，社会主义已走出谷底，虽然仍处于低潮，但缓缓有所回升。就共产党执政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稳住了阵脚，在 20 年中有很大发展。就世界各国共产党来说，已从 6600 万人发展到近 1 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国 8000 万人，朝鲜 400 万人，越南 300 万人，古巴 100 万人，老挝 10 多万人，加在一起近 9000 万人。资本主义国家有 120 多个共产党，总计近 800 万名党员。社会主义运动在“三南”的形势最好。一是“南亚”，印度有四个共产党，即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印共（毛），其

中印共（马）有 100 万党员，是议会第三大党，曾在西孟加拉邦执政 30 年，在喀拉拉邦也执政多年，目前虽遇到挑战，但总的形势是好的。印共也有 50 多万名党员。二是“南非”，南非共产党发展很快，已从 4 万人发展到近 10 万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响。三是“南美”。在拉美，古巴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委内瑞拉最为瞩目。查韦斯 1999 年通过选举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高举“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大旗，积极探索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于 2008 年当选委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该党现有党员 700 多万名，占全国总人口 2900 万人的 1/4 左右。他崇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把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拉美各国的左翼力量，敢于向美国叫板和与美国作对。在他执政时期，在拉美 33 个国家中，左翼力量在 13 个国家通过选举执政，其人口和面积分别占拉美的 70% 和 80%，极大地壮大了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推动了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形势一片大好。在这 20 年中，世界上发生最大变化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崛起。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走上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 9.8%，居世界第 1 位。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 11 位，到 2000 年上升到第 7 位，2004 年超过法国，2005 年超过英国，2007 年超过德国，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年总产值已达 6 万亿美元。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也只有 4000 多美元，排在世界 100 位左右。中国现在的定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总起来说，中国建国 60 年、改革开放 30 年所取得的成绩，堪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 19 世纪美国的崛起相媲美。

总括上述，苏联剧变后 20 年的现实是：资本主义遭致重创，新兴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回升和中国崛起，说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正在从单极走向多极，尽管霸权主义仍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和动乱，但是它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形势是向不利于资本主义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正如邓小平于 1992 年所指出：“社会主义经历

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苏联剧变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它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相信，肖枫同志《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会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坚定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读者和社会上产生良好效应。

2011年11月

序

李君如

10月12日上午，我收到肖枫先生来电，由于多年未联系，有点意外。他告诉我，计划写一本15万字的书，题目是《苏联解体我的解读》，简洁明快地回答有关苏联解体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还说：“习近平同志最近号召‘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将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而长期性课题，需要有一批相应的著作才行。尽管我已74岁，身体不如过去了，但还是想为此尽份力，于是想到写这本书。”一位老学者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我是在2000年和肖枫先生认识的。那时，我正在主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些课题的研究，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我们邀请他参加了当年10月中央党校举办的“四个如何认识”高级研讨班，因为此前我知道他主编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并刚撰写了《两个主义一百年》。当时胡锦涛同志亲自参加了两天的研讨会。肖枫先生曾多次在会上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陆陆续续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我都十分关注，有的他还寄给我看过，我们党校的有些活动也请他来参加。真是有缘，这次他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了。

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悲剧。今年正值这场悲剧发生20周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这场悲剧的经验教训，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

法。在我看来，对于这么大的一件事，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大凡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要形成统一看法是很难的。

肖枫先生是什么看法呢？这是我很关注的。关于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他有个观点很有道理，这就是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这次在《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肖枫先生说，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应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尽量避免瞎子摸象。他说，人们不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等等。从“合力论”的观点看，上述每一“说”都可能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其实，邓小平说的“四不”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讲的就是导致“死路”的“合力论”。

同时，肖枫先生说，坚持“合力论”当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应区分主次。就“外因”、“内因”而言，内因为主，苏联是自毁长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因当中，也应区分主次。他说：“现在这方面的分歧不小。我认为，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体制制度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党的原因。肖枫先生说，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致命性的。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苏联解体的进程表明，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使苏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丧失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最终遭民众抛弃。这样的党没法不亡。汲取苏共教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二是制度原因。肖枫先生说，制度体制问题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邓小平的说法，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苏共和苏联历史看，74年间领导人换了好几茬，新的领导人也有意解决前人的问题，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归根到底也要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

而且执政党的问题本身也是整个体制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强调党的问题而否定体制问题的根本性。

讲到体制问题，势必要涉及到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肖枫先生的观点是，苏共变质，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变质了。虽然苏共二十大之后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但从历史根源上讲，许多问题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去的，历史是不可人为地割断的。事实上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

西湖边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来，挖掉支撑它的最后一块砖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积月累地腐蚀着这座塔基的诸多历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也是这样的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主持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过程中，我也多次讲过类似的意见。最后，我们课题组的意见是这样表述的：“苏联东欧剧变，是20世纪下半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东剧变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来说，苏东国家在思想理论、体制制度上长期处于僵化状态，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从现实原因来说，苏东国家从摆脱僵化又走向了自由化，思想理论的混乱导致政治上混乱，从而失去了社会发展基本准则和方向。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又深远。”“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实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新思考。苏东剧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中发展和完善，但改革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二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

跟不上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党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的看法是，“制度”和“党”是两个关键问题，“僵化”和“自由化”都会葬送社会主义、毁灭党。因此，我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肖枫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还有许多这样经过长期思考、深入研究、反复斟酌的观点，值得我们大家重视。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为他作序的原因。

最后，我希望读者也能够喜欢这部著作。

2011年10月20日晚
于昆玉河畔